学术专论

# 露浓麦肥、草长豆稀*：清代台湾的春花与粮食供给

谢美娥

**[摘要]** 清代台湾每年例须陈报夏、秋粮食收成，秋收指稻作，夏收即春花和双季稻的早稻。春花是次要粮食，栽植普遍的番薯亦是。但政府规定春花须列入夏收报告，番薯则不必。番薯是馈贫之粮，植于园或畸零地。春花植于稻田，与稻形成轮作，被喻为接绝续乏之谷，可见其地位。以往研究清代台湾粮食者，次要粮食必议番薯，忽略春花。本文旨在阐明清代台湾春花的种植及其与主要粮食的关系，并检验清人视春花有平抑米价作用的认知是否合理。

**[关键词]** 春花　二麦　收成分数　粮食供给　清代台湾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8)－03－0062－16

## 一、前　言

清代台湾时期稻米是主要粮食，稻米之外最重要的次要粮食是蕃薯。这个简单的粮食作物体系图谱，是一般研究者对清代台湾的认知，并认为清人也这么以为。因此，像雨水粮价折中述称的“早禾悉已登场，晚禾陆续栽插，地瓜、芒蔗等项畅茂倍常”①这类的陈报内容经常被提及，研究者也视之平常、无何异处。

然而，官方档案中相关的农情陈报似乎透露了不可忽略的讯息，与前述的简单图谱有异。例如，乾隆年间闽台官员于春夏时节奏报台地农情时，常报告：“台郡春间久晴，二月内连得雨泽，春花麦苗甚为得济。”“福建内地各府及台湾一郡晴雨应时，春花畅茂情形节经臣恭折奏报在案。……台湾大麦已获丰收，小麦结穗饱满，地瓜繁盛，粮价日平。”或“已获之田乘此……翻犁播种二麦春花”等语，并称“台郡正、二月间节次得雨，二麦、地瓜等类甚为畅茂，早秧亦陆续布插，此时地瓜已可采摘供食，二麦亦届刈获，大可资以接济。郡城及诸、彰二县尚在

[收稿日期] 2017-12-12

[作者简介] 谢美娥（1963—），女，中国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台南 70101；mio168@mail.ncku.edu.tw

[基金项目] 中国台湾“科技部”专题研究计画“自然灾害、生产收成、价格平抑与清代的区域市场——以台湾米价（1738-1850）为中心的考察”（NSC97-2410-H-006-023-MY3）。

* 诗句原为“露浓滋得麦苗肥，草长还忧豆叶稀”，出自《台湾杂咏》，收于高拱乾：康熙《台湾府志》卷10《艺文志·诗》，第288页，《台湾文献丛刊》第65种。《台湾文献丛刊》，以下简称“丛刊”，使用台北“中研院”汉籍电子文献翰典全文检索系统，http://hanji.sinica.edu.tw/。

① 洪安全主编：《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第7册，台北“故宫博物院”，2001—2003年，乾隆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第650页。

开仓平粜，米价虽略减，未能甚平。”还有，乾隆八年（1743）四月，官员奏称，当时谷价在 7 钱上下，稍昂，但“望春花收获，庶几可减”。①

承上述，名为春花的作物或大、小二麦的种植，在地方官员的视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春花二麦不但不亚于番薯挹注粮食的角色，而且对于平抑米价升昂的作用甚于番薯或稻米以外的其他粮食。清人的这种认知，是否合理，合于台地实情？亦即，在清代台湾，春花二麦与主要粮食稻米之间的供给关系如何？是否具备平抑米价升昂的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近人论著凡述及清代台湾粮食者必以米谷为议，未见对春花大小二麦在粮食作物体系中的作用有何讨论。例如王世庆、谢美娥，两者以分析米价变动及其变动因素为主，重视稻米的耕作、生产与流通，皆未关注春花二麦。②而研究春花二麦者，例如川胜守指出明末清初开始出现以春花复种作为越冬作物（麦类、豆类和油菜），至十八世纪中叶普遍见于长江流域各省。③川胜守提出的春花之述，王业键等人将之用于十八世纪粮作区的区划依据。④然而两者皆宏观之论，并不针对个别区域细探。至于讨论个别区域主要与次要粮食彼此间的消长，亦即粮食作物体系与粮价变动的关联，目前有处理湖北米、麦作物关联之个案，清代台湾则尚未见研究。⑤

春花作物的核心其实是二麦，本文拟透过二麦价格与米价变动的关联、二麦收成对米价变动的影响等两方面来考察。这两项考察使用的数据史料包含：清代粮价清单中的台湾米价和二麦价格、福建省二麦收成分数中的台湾部分。其中，二麦价格和二麦收成分数两种，以往研究清代台湾史的学者未曾利用。本文使用的米价，取自谢美娥《清代台湾米价研究》中经过可靠性评估与补值后的中米米价数列，二麦价格取自王业键编的《清代粮价资料库》。⑥而清代台湾的收成分数史料，目前仅谢美娥《自然灾害、生产收成与清代台湾米价的变动（1738-1850）》一文利用，惟该文使用的是稻作收成分数，未含二麦。⑦

以下先对清代台湾春花二麦的内容稍做说明，并区别此种粮食作物在清人认知的粮食供给作用中与番薯的差异，继而考察它在粮食供给体系中的地位。

## 二、馈贫之粮与接绝续乏之谷：番薯与春花

### （一）番薯做为次要粮食

稻米是台民日常主食，也是台湾清代时期重要的出口商品。稻作地区的民间饮食习惯，很可能将米粮卖出，而以其他粗粮或次要粮食裹腹。例如乾隆十九年（1754）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报：

> 台郡负贩力穑之民，大概以番薯为食，不专藉米粮。⑧

---

① 引自下列各种来源：洪安全主编：《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第 7 册，乾隆十八年三月初八日、乾隆二十年三月初五日、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第 72、281、378 页。《军机处全宗（1729—1911）》之《军机处录副雍正、乾隆朝》，乾隆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 03.0813.07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全国水利雨水自然灾害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0 年，乾隆八年四月初四日，缩微编号第 693 卷，档号 9720.7。

② 王世庆：《清代台湾的米价》，收于王世庆：《清代台湾社会经济》，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 年，第 73—91 页。谢美娥：《清代台湾米价研究》，稻乡出版社，2008 年，第 3、5 章。

③ 川胜守：《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 年，第 2 章。

④ 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十八世纪中国的粮食作物分布》，收于王业键：《清代经济史论文集》第 1 册，稻乡出版社，2003 年，第 73—101 页。

⑤ 谢美娥：《贩运者多：十八世纪湖北的粮价与粮食市场（1738-1797）》，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第 4 章。

⑥ 谢美娥：《清代台湾米价研究》，第 85—100 页。王业键编：《清代粮价资料库》，见 http://mhdb.mh.sinica.edu.tw/foodprice/。

⑦ 谢美娥：《自然灾害、生产收成与清代台湾米价的变动（1738-185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 年第 4 期，第 110—127 页。

⑧ 洪安全主编：《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第 7 册，乾隆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第 252 页。

按其言，“负贩力穑之民”的日常三餐并不食米。但是盛产米谷的台湾并不必然为了出售稻米而不食米，例如至 1830 年代依旧粮食自给有余的彰化县，与凤山、嘉义并称“其米多可粜者”，[①]其地民食：

> 每日三餐，富者米饭，贫者食粥及地瓜，虽歉岁不闻啼饥也。[②]

“负贩力穑之民”与贫者的主食大概以粥和番薯（地瓜）为主，富者则以米为主，粮食选择伴有社会层级的差异。虽然如此，粥即米、饭煮成，仍是食稻。可见以番薯辅食并非米产区全民皆然的饮食型态，无论贫富，干饭或粥汤，三餐都吃米食。十八世纪初期，一种栽于园中、夏种秋熟、名为“埔占”的陆稻，“先年皆用以酿酒，近年谷贵，与占粟颇相类，三餐皆用之矣”。[③]因为习惯食米，在米价稍微昂贵的时期，取以代之的是相近品种（口味）的米，而不一定不食米。另，从连横《雅言》的记载可知，晚至二十世纪初期，“台湾为产米之地，一日三餐，大都一粥二饭。濒海贫瘠之区，多食番薯”。[④]平常人家的三餐都还是以米为食，每日维持一粥二饭的习惯，只有濒海贫瘠地区（可能无法种稻），才代之以番薯。

以上史料显示，米谷虽然是清代时期台湾的输出大宗，但也是台民三餐主食所依。同时也指出，番薯作为次要粮食的作用，与贫民维生较有关联，是“薯之滋养当不逊于稻、麦，而齐民受惠，诚可谓馈贫之粮”[⑤]。番薯田园两宜，随剪随插，四时皆易植，一岁多收，被誉为粮食中“似贱而实贵者”。[⑥]

此外，番薯的种植、普及也与瘠地、地土条件不能种稻有关。台湾县“沙土浮松，向来少种旱禾，惟栽地瓜、杂粮”，十八世纪时番薯栽植已见加广，可“饔飧佐谷，农民咸藉以为半岁粮”。[⑦]再如凤山县，虽水田为多，其旱田“可接连播种甘蔗、番薯、花生各项杂粮”，增加粮食总产量。[⑧]又，澎湖地皆斥卤，不堪播谷，因此“澎人之饭，并无稻米甑饭，惟用薯干煮粥而食，名曰薯米”，正可谓“番薯当米度年华”。[⑨]

番薯作为次要粮食的作用，必定包含天灾人祸导致主要粮食歉收时供给粮食的功能。例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因风灾、旱灾造成的歉收，幸赖随地种植的地瓜为济。嘉庆十一年（1806）六至七月受蔡迁“匪乱”波及与用兵之处，用“番薯二两抵米一合，配搭散给”难民和米煮食，共耗 5 967 142 斤，数量不可谓小。[⑩]十八世纪初，清人已称“薯以济荒，功用最大”。[⑪]那么，以上所述适于贫民、瘠地、济荒的属性和功能，番薯的角色不言可喻，而春花二麦作为次要粮食，能在这三方面起什么作用?

---

① 姚莹:《覆曾方伯商运台米书》(道光二十一年)，见姚莹:《中复堂选集》之《东溟文后集》卷 7，第 136 页，丛刊第 83 种。

② 周玺：道光《彰化县志》卷 9《风俗志 · 汉俗》，第 288 页，丛刊第 156 种。

③ 王礼主修，陈文达编纂：康熙《台湾县志 · 舆地志 · 土产》，第 7 页，丛刊第 103 种。

④⑤ 连横:《雅言》，第 80-81 页，丛刊第 166 种。

⑥ 吴子光:《台湾纪事》卷 1《纪台中物产》，第 9 页，丛刊第 36 种。

⑦ 吴子光:《台湾纪事》卷 1《纪台中物产》，第 9 页，丛刊第 36 种。

⑧ 洪安全主编:《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第 7 册，乾隆三十年四月初八日，第 635 页。王礼主修，陈文达编纂：康熙《台湾县志 · 舆地志 · 土产》，第 16 页。王必昌：乾隆《重修台湾县志》卷 12《风土志 · 土产》，第 414—415 页，丛刊第 113 种。

⑨ 洪安全主编:《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第 7 册，乾隆二十九年二月十日，第 456 页。

⑩ 胡建伟：乾隆《澎湖纪略》卷 7《风俗纪 · 习尚》，第 149 页；卷 12《艺文纪 · 诗》，第 283 页，丛刊第 109 种。洪安全主编:《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第 7 册，乾隆三十年四月初八日，第 635 页。连横:《雅言》，第 80 页。

⑪《军机处全宗（1729-1911）》之《军机处录副雍正、乾隆朝》，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 03.0315.005。《台案汇录辛集》卷 4《六二、户部副折》，《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臣宗室禄康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嘉庆十三年六月，第 186 页，丛刊第 205 种。

⑫ 周锺瑄修，陈梦林等编纂：康熙《诸罗县志》卷 12《杂记志 · 外纪》，第 300 页，丛刊第 141 种。

### （二）春花做为次要粮食

什么是春花？十五世纪晚期苏南地区出现将二麦、豆类和油菜等作物复种于稻收之后（同种稻之田），于来春收获，称为春熟或春花。到十八世纪，以春花复种作为越冬作物的耕作普及于长江流域各省。春花作物群的组合很有弹性，麦类作物以大、小二麦为主，偶或加入荞麦；菜类作物以油菜为主，也可包含瓜类和蔬菜类作物；豆类作物则有蚕豆、豌豆、菉豆等。① 而台湾的春花包含什么作物？根据官员的折报，笔者认为应指二麦，而且春花、二麦两词常常并用，或单称二麦（也不排除可能将冬春之际栽种的菜类和豆类泛含在内）。② 逢秋入冬到来春期间，关于春花的生长情报，地方官员必定上呈。例如奏报上年十二月雨水是否调匀，春花是否青茂在田；或奏报今春月分得雨状态，春花二麦可否咸资润泽；到了三月收成时节（有的二月即可收），则须奏报春花是否俱获丰收。③ 乾隆年间有关台湾农作的奏折经常出现“麦已收竣，正赶种晚禾”、“晚收后将次种麦”、“晚稻收割全竣，田间及时播种二麦”、“晚禾收获之后接种二麦”以及前引“已获之田乘此……翻犁播种二麦春花”之类的报告，可知一年两收的稻麦制成形。④ 春花在二、三月起陆续收获，种植须占大田，且与稻作接茬，只有栽种二麦需要这样的条件。这表示十八世纪台湾的春花主要指二麦（或就是二麦），呼应上文所引清代官员折报谷价升昂时“望春花收获，庶几可减”之语，对于一年可多次收获的番薯收成则少有这等期望。

换言之，在清人的认知中，二麦地位较番薯为要，将之定位为“旧谷既没，新谷未升，二麦先熟，接绝续乏”的粮食，亦即主要粮食供给不及之时，较能发挥接续替代角色者首推二麦，这几乎是主要粮食的地位。⑤ 这种观点由来已久，非清代才形成，也与大陆内地长期的作物改良发展有关，故台湾志书云“古称麦为接绝续乏之谷，方夏，旧谷已没，新谷未登，二麦先熟，接续无忧”。⑥ 二麦是北方旱地作物在水稻区扩张以增加粮食生产较为成功的作物，明清时期向南及向边远地区传播。十八世纪的“水稻小麦区”，就是旱作的麦与水田的稻形成水旱轮作，构成该区主要特征。⑦ 以福建而言，官方认为，二麦有收，将来才可“无青黄不接之虞”。⑧ 因此，福建“虽田土之肥瘠、产谷之多寡，各有不同，但早晚两禾之外，亦种二麦、杂粮，以资民食”。⑨ 从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巡抚周学健的奏文可以看出，闽省官员如何定位春花二麦的角色：

> 闽省上年七月天时亢旱，虽续经得雨，而被旱稍久之福州、福宁、泉州三府属，间有收成歉薄处。现饬各该县亲行巡察，其有实系贫户，即借给仓谷，赶种春花，以资接济。若米价昂

① 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十八世纪中国的粮食作物分布》，第 89、95 页。

② 将春花与春花所含作物并称或连称并非台湾特有的情形，像雍正七年（1729）福建巡抚奏报闽省“今年菜麦春花处处十分丰熟”，即是一例。见《雍正朱批奏折选辑》（一），《福建巡抚刘世明奏闻二麦丰收折》，雍正七年四月十三日，第 47 页，丛刊第 300 种。

③ 潘思榘：《奏报地方情形》，乾隆十七年二月初六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文献编号 007986。温福：《奏报地方雨水情形》，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初六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文献编号 01179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全国水利雨水自然灾害资料》，乾隆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缩微编号第 695 卷，档号 9727.14。

④ 洪安全主编：《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第 7 册，乾隆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乾隆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第 564、594、688 页；第 8 册，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181 页。

⑤ 周锺瑄修，陈梦林等编纂：乾隆《诸罗县志》卷 10《物产志 · 物产 · 谷之属》，第 193 页。

⑥ 王必昌：乾隆《重修台湾县志》卷 12《风土志 · 土产》，第 411 页。

⑦ 何炳棣认为中国农业的核心为作物制度，作物的改善使原有的土地利用改变，进而增加粮食生产，是人口增长的有利因素。北方旱地作物向南推广，是作物制度长时期稳步改善的重要变化，尤其是小麦，到十八世纪时显著扩植。何炳棣：《1368-1953 年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75—182 页。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十八世纪中国的粮食作物分布》，第 91—95 页。

⑧《雍正朱批奏折选辑》（一），《福建总督刘世明钦奉上谕折》，雍正十年正月二十六日，第 58 页。

⑨ 道光《福建通志台湾府 · 蠲赈 · 赈恤 · 闽政领要》，第 187 页，丛刊第 84 种。

贵，再酌平粜。[1]

据周学健称，乾隆十年（1745），福州、福宁、泉州三府由于被旱，秋收歉薄，影响当年冬季到下一年秋收之前这段青黄期的粮食供给，因此秋季赶种春花二麦，可在青黄期内先行济食，不必挨到秋季稻获之后。春花二麦的角色，是接续主要粮食欠缺时，维持民食供给不中断的利器。这点，台湾与福建内地无异。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乾隆十九年（1754）的奏报就说台湾“各厅县所种二麦，二月即届成熟，明春接济，民食不患无资”。[2] 喀尔吉善此语，是报告该年台湾、诸罗、彰化三县九月被风成灾后米价上涨显著，应该如何因应来春可能民食无资的看法。主要粮食作物于收成季节逢灾，以致收成不佳，粮价突升，官方的应对之道，春花二麦是其一，视春花二麦几近于主要粮食地位的观点立刻显现。就这点而言，二麦做为次要粮食的角色与番薯相当不同。番薯适于贫民、瘠地、济荒的属性和功能，除济荒之外，二麦皆未具备。尽管如此，番薯却一直未被定为可接续主要粮食地位的粮食。

既然春花二麦地位较番薯为高，那么此种粮食在台湾常民生活中做何用途？康熙《台湾县志》说“大麦可以疗饥，小麦磨粉成面，功用甚溥”，乾隆《重修台湾县志》强调“小麦尤佳，可磨为面，利用甚溥”。[3] 大麦可酿酒，小麦用处较大麦为多，以其粉做酱、做糕饼。[4]《安平县杂记》记述牛磨店司阜的职务是“磨小麦及地瓜签为粉，以便作面线及作大面、龟粿、饼料等食品之用”。[5] 另，台湾婚俗中的纳采仪式中，女方“回以大饼；其余……留三、四种，各以稻谷、麦、豆置于盘内”，为必要的程序。[6] 若用于文庙祭仪，是以小麦面做“白饼”；若用于丧俗，则是“麦饭纸钱人上冢”。[7] 徐宗干《斯未信斋杂录》记治痧症、疟疾的灵通万应丹的制作，成分之一为用大麦面拌匀，晒干研末。[8] 但在澎湖，“民艺二麦饲牛”，“惟有播种二麦，如西北饲骡马锉青一法，不十日可以萌芽，刈之喂牛”。[9] 这是指以麦草喂养牲畜。归言之，清代时期台湾，除澎湖外，二麦若供人食用，以小麦用途最广，面食、糕饼应该颇为普及。

那么，在清代台湾已经食用普及的春花二麦，其栽植始于何时？十七世纪初陈第《东番记》云：

> 无水田，治畬种禾，山花开则耕，禾熟，拔其穗，粒米比中华稍长，且甘香。……谷有大小豆、有胡麻，又有薏仁，食之已瘴疠；无麦。蔬有葱、有姜、有番薯、有蹲鸱，无他菜。[10]

这条史料明白指出，当时农作有禾、番薯，但无麦。雍正元年（1723）奏称台湾府十月割晚稻，正是布种“春麦”之时，“高下之区俱在种麦，以冀春收”。[11] 晚稻收获后接种的春麦即二麦。不到百年，稻麦制已然成形。雍正三年一份农情报告称“春花、黄豆、大小麦等项丰收”，此时

---

① 《清高宗实录选辑》(一)，乾隆十一年，第 47 页，丛刊第 186 种。像这类内容的奏报不胜枚举，笔者只是例举一折作为讨论。

② 洪安全主编：《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第 7 册，乾隆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第 252—253 页。

③ 王礼主修、陈文达编纂：康熙《台湾县志 · 舆地志一 · 土产》，第 7 页。王必昌：乾隆《重修台湾县志》卷 12《风土志 · 土产》，第 411-412 页。

④ 屠继善：光绪《恒春县志》卷 9《物产 · 谷之属》，第 139 页，丛刊第 75 种。

⑤ 佚名：日治初期《安平县杂记 · 工业》，第 83 页，丛刊第 52 种。

⑥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 2《赤崁笔谈 · 习俗》，第 39 页，丛刊第 4 种。

⑦ 刘良璧辑：乾隆《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 9《典礼 · 祀先师礼 · 治祭物》，第 266 页，丛刊第 74 种。郑用锡：《北郭园诗钞》卷 3《七言律诗七十七首 · 苦雨》，第 44 页，同治九年刊本、刻本，丛刊第 41 种。

⑧ 徐宗干：《斯未信斋杂录》《归田续记》，第 117 页，丛刊第 93 种。

⑨ 林豪、潘文凤：光绪《澎湖厅志》卷 11《旧事 · 祥异》，第 377 页；卷 13《艺文中 · 禀牍》，鲍复康：《上臬道宪刘公禀》，第 418 页，丛刊第 164 种。

⑩ 沈有容：《闽海赠言》卷 2《记 · 东番记》，第 25—26 页，丛刊第 56 种。

⑪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年，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第 142 页。

已列报春花。[①] 据1680年代、1690年代成书的两种《台湾府志》，其物产志皆列有大小二麦的种收季节。[②] 序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赤崁集·春日农圃言》诗云“二月刈新麦”，而序于康熙五十六年的《诸罗县志》则记“杂税者……为蔗车、为牛磨，蔗车以煮糖、牛磨以粉麦为面者也，皆有饷。”[③] 既按牛磨课饷，由粉麦可以推测，此时应有二麦种植。由以上史料可以推知，至少在十七世纪晚期台湾已有春花二麦的栽植，只是春花与二麦混称，应是后来常有的现象。

春花二麦十七世纪晚期台湾已见栽植，十八世纪形成与稻接茬轮作，在现存闽台奏折中几乎年年都记有栽植讯息，方志也有相当的陈述，但曾几何时现代学界有关台湾土地利用的描述，几乎只聚焦于稻、蔗，对粮食作物的认知也仅稻和番薯，不知春花二麦为何物。以下列举几种史料，勾画台湾清代时期的二麦分布图像。康熙五十四年耶稣会士冯秉正（Mailla, 1669-1748）写于江西九江寄给本会的信如此记述：

> （1714年4月15日）中午时分我们进了台湾港——这里是该岛首府。……我们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绘制岛上属于中国的地区的地图。……雷孝思、德玛诺神父和陪同我们的两名鞑靼人挑选了岛屿北部地区；我和另两名陪同我的鞑靼人选了首府所在地区、岛屿南（部地区）……岛上中国人占据的地区真无愧于人们给它所起的名字：这是一个极美的地区，那里空气洁净清朗，盛产各种谷物……田野上长着许多小麦和水稻。[④]

冯秉正赴台实地测绘所见，当时台湾农田已植“许多小麦和水稻”，小麦并不稀罕。雍正七年（1729）四月福建总督高其倬奏称：

> 近据台湾各处禀报：现今二麦业已刈获，收成十分有余，小麦每石卖六钱，大麦每石卖三钱，米价亦因之更减，每石卖九钱六七分。[⑤]

由此奏可知，十八世纪初期官员奏报台地二麦收成，已经以分数呈现，而二麦收成的重要性，一如前文所述，是因被认为对平抑米价上升能起到作用。可是雍乾之际，也可见到“台湾向不种麦”、“台湾海外不种二麦”、“台地俱系稻田，种麦者少”或“鲜栽二麦”等奏报。[⑥] 雍正十二年（1734）福建布政使刘藩长于二麦登场之后汇报“台湾府属四县收成各有八分”，表示台地各县（不含淡水厅）都种二麦。[⑦]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提到：

> 二、三两月……诸邑收大麦、小麦（十月、十一月间种），近台属者二月收，远处者三月收。[⑧]

黄叔璥所说，大概是四县都种麦，“近台属者”应指台湾府城一带，府城以北的诸罗都种。尹士俍《台湾志略》也说：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册，雍正三年三月十六日，第632页。

② 蒋毓英著，陈碧笙校注：康熙《台湾府志校注》卷4《物产》，厦门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0页。高拱乾：康熙《台湾府志》卷7《风土志·土产》，第197页，丛刊第65种。

③ 孙元衡：《赤崁集》卷3《丁亥》，第42页，丛刊第10种。周锺瑄修，陈梦林等编纂：康熙《诸罗县志》卷6《赋役志·饷税·陆饷水饷杂税考》，第96—97页。

④ 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2卷，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161、165页。

⑤ 《雍正朱批奏折选辑》（二），《福建总督高其倬奏闻事折》，雍正七年四月十二日，第180页。

⑥ 《雍正朱批奏折选辑》（二），《福建巡抚赵国麟报麦收分数并早禾雨水情形折》，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五日，第208页；《福建总督郝玉麟、福建巡抚赵国麟奏二麦丰茂逾常早禾亦多畅茂折》，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五日，第24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2册，雍正十年闰五月二十四日，第561页。《清高宗实录》卷100，乾隆四年九月上。

⑦ 《雍正朱批奏折选辑》（二），《福建总督郝玉麟、福建巡抚赵国麟恭报闽省二麦收成分数折》，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第255页。

⑧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3《赤崁笔谈·物产》，第51页。

南路地热，二麦不宜。北路稍寒，可以种麦，三月告成，与淮北各省麦秋迥异。[①]

类似的记载在朱景英《海东札记》中也可见到：

南路地热不宜麦，北路种者甚多；三月可收，不待麦秋也。凡小麦开花，北地以昼，南方以夜。台麦如北地，故其性最良。[②]

尹、朱两则史料都说台湾小麦质地佳，麦熟又较大陆北方早，尤以北路（台湾府城以北，诸罗、彰化）种麦较适。乾隆十一年（1746）奏报麦收时称“台湾、凤山二县向不种二麦，彰化一县向不种大麦”，仅收小麦，诸罗大小麦皆能收；[③] 清楚区别种麦县份的差异。乾隆十七年，福州将军新柱奏报二麦播种时加入了淡水厅，“除台湾、凤山两县外，其诸罗、彰化、淡水地方二麦已下种”。[④]

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期，麦作在台地土地利用方面仍有其地位。嘉庆九年（1804）十一至十二月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巡阅行伍、查看地方民情及番塾庄社，北路自嘉义到淡水，南路自凤山到冈山，返回驻地后疏奏巡查所见印象为：“田间现种豆、麦、地瓜、蔬菜，青葱满目”。[⑤] 可知，田间种麦是台地冬季农作风景之一。

另，晚清台南知府唐赞衮诗云“赤日烁田园，渴雨麦焦死；田园复何有，黄埃间苍耳”；并自注说明，称“癸巳夏，台南郡久不雨，时余随同镇、道虔诚祈祷，不胜殷盼，赋此”。[⑥] 癸巳应是光绪十九年，夏季应为中历四至六月，台南府城一带自十八世纪即植麦，府内安平县（台湾县）向来不种早禾，[⑦] 所以夏季田间主要的收获应是二麦，因而认为若麦粒成熟期因渴雨而枯死，则田园不复有收。唐赞衮的《山行观稼》诗也称“台田种稻兼麦菽”，麦作为次要粮食作物的重要性可见一班。[⑧] 一本刊刻于光绪十八至十九年间的《全台游记》记此地“稻、粱、菽、麦，年每三熟”，云：

自鸡笼洋码头至台北府大稻埕，计程三十里，皆绕山曲折而行，溪谷奇宕，风景如画。时已残冬，田中麦穗、秧针，黄绿相间，犹是内地四、五月景象，则地之肥暖可知。[⑨]

游记所记为由此可知鸡笼码头至台北府大稻埕，是台北地区的麦田。又，吴德功《观光日记》称：

过大肚溪，抵中寮……四月闲人少，经营子妇忙。蔬园多下种，蔗廍尚研浆。雨后薯藤秀，风前麦浪扬。[⑩]

日记说的是中部地区的麦田。两种游记，一记冬季，一记夏季四月（可能是西历）。秧针是指稻秧，麦穗、麦浪则指进入成熟期的二麦或小麦。这种麦作成长的田园景象，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沈葆桢由台湾府城往琅峤履勘，经过凤山、东港、枋寮时，就有相似的观察，他描述：

---

① 尹士俍著，李祖基点校：乾隆《台湾志略》中卷《出产水利》，九州岛出版社，2003 年，第 84 页。在六十七、范咸纂辑的乾隆《重修台湾府志》卷 17《物产 · 五谷 · 麦之属 · 附考》（丛刊第 105 种）第 487 页引《台湾地略》，也有一样的文字。

② 朱景英：《海东札记》卷 3《记土物》，第 31 页，丛刊第 19 种。

③ 《军机处全宗（1729-1911）》之《军机处录副雍正、乾隆朝》，乾隆十一年闰三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 03.9740.064。

④ 洪安全主编：《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第 7 册，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65 页；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十三日，第 559 页。王瑛曾：乾隆《重修凤山县志》卷 4《田赋志 · 杂饷 · 附录》，第 121 页，丛刊第 146 种。十八世纪不种麦的地方还包括澎湖，见洪安全主编：《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第 7 册，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十三日，第 559 页。

⑤ 见《台案汇录丁集》，《兵部为内阁抄出台湾总兵爱新泰奏移会》，第 186 页，丛刊第 178 种。这一类的农情奏报经常可见，例如道光六年（1826）总兵蔡万龄于十一月、道光八年（1828）总兵刘廷斌于九至十月巡阅全台水陆营伍及南北两路地方情形后即奏“现种地麦、豆、瓜各项杂粮”、“男妇正收花生，现种豆、麦、地瓜各项杂粮”云云。

⑥⑧ 收于《台湾关系文献集零》，第 178、153 页，丛刊第 309 种。

⑦ 洪安全主编：《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第 7 册，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第 401 页。

⑨ 池志征：《全台游记》，收于池志征等：《台湾游记》，第 1、4 页，丛刊第 89 种。

⑩ 吴德功：《观光日记》，收于池志征等：《台湾游记》，第 40 页。

时已残冬，麦穗、秧针，黄绿相间，则内地四月间景象也。该处（枋寮）尚为凤山壤则之区，过此以往，则皆番社，居民寥寥矣。[①]

府城以南地区二麦栽植相对较少，但在冬季，仍是田间显著的农作地景。[②] 西部农田之外，噶玛兰二麦的栽植较晚。嘉庆二十年（1815）官员曾奏报一年可以两冬的噶玛兰并不种麦，道光时期的折奏也是如此，但是咸丰《噶玛兰厅志》的《物产志》却列有二麦。[③] 笔者搜集的二麦收成分数中，宜兰可列为一区计算分数者，最早是光绪十二年（1886）。若再阅看光绪时期的朱批奏折，则台湾建省后官员指称"向无栽种二麦"的地区已无宜兰。[④]

此外，笔者觉得有意思的是，麦谷也曾是清代台湾地租的一项。一份光绪十九年的合同记称：

立合同字人平埔刘文观、吴添观、潘三枝、赵顺来等，因本年十月间，招垦众佃户移徙致居大埔庄，经向埤南新街张义春号当堂面议，日后开垦成田园，万年永远，众垦户每年每季谷、麦、麻、豆、地瓜，付垦首张义春号一九抽收。[⑤]

这里是说当土地开垦成田园后，每年收获季，垦户必须支付垦首的实物收成不仅是稻谷，还包含了麦谷及其他次要粮食作物的收成。既须缴交麦谷，必有相当的土地种麦（惟无法确定究为大麦或小麦）。例如，一则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契字记录：

立杜卖尽根田契字人刘天喜，有承祖父遗下水田一所……水田三段……麦田一段，东至李家田，西至清元侄田塍，直透出尾为界，下节东至阴沟出尾为界，南至吴家田塍为界，北至吴家田为界。[⑥]

据此契文，立契人刘天喜所卖土地包括"水田一所"、"麦田一段"，稻麦两作，分地而植；此契立契时为十一月，水田应已休耕，麦作应已播种。[⑦]

以上，二麦的分布区，自十七世纪晚期以后至晚清，嘉义、彰化、淡水是二麦产区，台湾、

---

① 沈葆桢语见《福建台湾奏折》,《请琅峤筑城设官折》，第 23 页，丛刊第 29 种。

② 十八世纪台湾府城以南地区不栽或少栽二麦，史料所述已多，凤山是其一。至于恒春，光绪十四年（1888）称"恒春一县系新设地方，逼近内山，向未据报麦收分数，究竟能否一律播种。"光绪十五年（1889）起已列为"向无栽种二麦"区。但光绪末年《恒春县志 · 物产 · 谷之属》（第 139 页）列入二麦为该县作物，同书《物产 · 饮食之属》（第 191 页）却云"面：恒邑无麦，皆自外来。"据光绪二十年（1894）台湾巡抚邵友濂奏二麦收成分数，"埔里社厅、苗栗、澎湖、凤山、恒春、基隆等厅县均无栽种二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 92 册，中华书局，1995—1996 年，光绪十四年五月十七日、光绪十五年八月初七日，第 701、761 页。邵友濂：《奏为台湾各属光绪二十年分二麦收成分数由》，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八日，台湾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文献编号 135404。

③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文献股：《宫中档嘉庆朝奏折》第 32 册，台北"故宫博物院"，1993-1995 年，嘉庆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第 304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 · 嘉庆朝 · 农业类》，嘉庆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嘉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缩微编号 138，档案编号 1879.37、1881.24；嘉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缩微编号 150，档案编号 2049.17。《内阁汉文题本：北大移交部分》，道光二年五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缩微编号 121，档案编号 3253.4。陈淑均：道光《噶玛兰厅志》卷 6《物产 · 谷之属》，第 246 页，丛刊第 160 种。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92册，光绪十二年五月（日未载）、光绪十四年五月十七日，第629、701页。

⑤《台湾私法物权编》卷 1《合同字》第 21 号，第 36—37 页，丛刊第 150 种。

⑥《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第 3 章第 11 节《番大租 · 其它契字〉第 31 号，第 739—740 页，丛刊第 152 种。

⑦ 不过，令人怀疑的是，此处的"麦田"会不会是种番麦的土地？康熙《台湾县志》将番麦与二麦、荞麦并置于麦之属（王礼主修，陈文达编纂：康熙《台湾县志 · 舆地志 · 土产》，第 7 页，其性状"实如石榴子，一叶一樾，樾数百粒，土人谓之番麦。"（朱景英，《海东札记》卷 3《记土物》，第 31 页）实即玉米、玉蜀黍，是原住民耕地的粮食之一。嘉道之际的《续修台湾县志》记"番麦，番人种之，美亦远逊，常种。"（谢金銮、郑兼才：道光《续修台湾县志》卷 1《地志 · 物产》，第 52 页）《新竹县志初稿》也提到"顶山番做田，每年四次：番麦熟，曰麦田，稷仔熟，曰稷仔田；七月为大田……八月为尾田。"（郑鹏云、曾逢辰：光绪《新竹县志初稿》卷 5《考一 · 风俗 · 番俗》，第 191 页，丛刊第 61 种）然而，据福建巡抚丁日昌请豁台湾杂饷奏文称："查杂饷名目繁多，内如归化生番，不植稻麦，无区亩可计，无田粮可科，仅知捕鹿、种麦，按数纳饷，即以鹿皮、小米为名。"（《台湾私法物权编》卷 1《奏折》，第 58 页）前一麦应指二麦或大小麦，后一麦应指番麦。如此，按行文语意，上引平埔族刘文观等人合同中的麦租，或许不是番麦之租亦未可知。

凤山二县与澎湖厅则无麦作或少量麦作。

最后，春花二麦为接绝续乏之谷，如何接绝？可从其生长季节察看。台地春花二麦种收讯息的汇报，一直持续到同治、光绪年间，笔者以这类史料和方志的记载，整理出二麦的生长季节。[①]如表 1 所示，二麦播种期为九至十二月，以九、十月为主（皆中历月）。收获期则是从二月下旬到五月都能收，但以三、四月为主。以节气而言，则是冬种夏熟，或立冬种清明熟。以此推，一年之中麦价的低价期应在三至五月（西历 4 至 6 月）之间渐趋低价，而以四至五月（西历 5 至 6 月）较为显著。若与米价季节变动（图 1）对照，则可知麦价渐次趋低的 4 至 6 月（西历）正是米价渐为趋高的月分，亦即台谷的青黄不接期。尤其 6 月，是米价的最高月分，也是麦价的最低月分。故所谓二麦接绝之说，似属合理。不过，据乾隆十九年（1754）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折：

> 据台湾道抡穆齐图禀称："内地青黄不接在春夏之交，台地青黄不接转在隆冬之候，缘此时番薯、二麦甫经播种，寒冬岁暮米价又昂，穷民未免拮据，请于岁内开仓分厂平粜。"[②]

喀尔吉善认为台地的青黄不接期是"隆冬之候"，若是如此，则二麦未必如官方宣称的"明春接济，民食不患无资"那样有地位。但是以 1738-1850 年米价季节变动来看，"隆冬之候"是台地米价的低价期，并非青黄不接期，其说应予保留。按折文脉络，喀尔吉善和抡穆齐图的看法应是指该年九月风灾后秋冬米价升昂的特殊情形，并非常年常态。此处从二麦、稻的生长季节来看，初步可接受二麦具备接绝续乏角色，下文将从价格变动进一步确认。

**表 1　清代台湾二麦的生长季节**

| 作物 / 中历月 | 播种月 / 节气 | 收获月 / 节气 |
|---|---|---|
| 二麦 | 9，10，11，12；立冬种、仲冬种、秋末迄冬、冬种 | 2 下旬，3，4，5；夏熟、清明熟 |
| 大麦 | 10；冬至种、立冬种 | 3，4；清明熟 |
| 小麦 | 8，9，12；种于深冬 | 2，3；成于初夏 |
| 春花 | 10；秋冬 | 3，4 |
| 春麦 | 10 | 4 末 5 初 |

资料来源：洪安全主编：《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第 3 册，台北"故宫博物院"，2001—2003 年，第 2025 页；第 7 册，第 241、378、513、529、539、594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 册，第 142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5 册，第 26 页；第 18 册，第 842 页；第 25 册，第 617 页；第 26 册，第 101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全国水利雨水自然灾害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0 年，缩微编号第 693 卷，档号 9720.7；缩微编号第 695 卷，档号 9727.5、9727.10、9727.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朝・农业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缩微编号 137，档案编号 1869.76。《军机处全宗（1729−1911）》之《军机处录副雍正、乾隆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03.0813.075、03.0818.081。台湾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乾隆十四年二月十三日、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文献编号 004082、008607。孙元衡：《赤嵌集》卷 3《丁亥》，第 42 页，丛刊第 10 种。王礼主修，陈文达编纂：康熙《台湾县志・舆地志・土产》，第 7—8 页，丛刊第 103 种。尹士俍著，李祖基点校：乾隆《台湾志略》中卷《出产水利》，九州岛出版社，2003 年，第 84 页。刘良璧辑：乾隆《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 6《风俗》，第 108 页，丛刊第 74 种。六十七、范咸纂辑：乾隆《重修台湾府志》卷 17《物产一》，第 487 页，丛刊第 105 种。王必昌：乾隆《重修台湾县志》卷 12《风土志・土产》，第 411 页，丛刊第 113 种。王瑛曾：乾隆《重修凤山县志》卷 11《杂志・物产》，第 282 页，丛刊第 146 种。

---

① 《题本：雨水收成》第 11 册，同治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第 108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全国水利雨水自然灾害资料》，光绪十四年五月十三日，缩微编号第 712 卷，档号 9955.9。

② 洪安全主编：《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第 7 册，乾隆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第 253 页。

## 三、二麦价格与米价变动的关联

清人认为在米谷供给的青黄不接时期即可收成的二麦，对这时期正处于逐月上升的米价水平有平抑的作用，并且从这两种作物的生长季节来看，二麦的确符合具备接绝续乏的地位。若是如此，则这两种粮食价格的变动必有相当程度的相关，笔者将利用相关分析法加以验证。

清代台湾的二麦价格可从王业键《清代粮价资料库》中取得，采用年段起自乾隆三年四月（1738 年 5 月），下限到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1757 年 12 月）。二麦的粮价报告与米价同列于省级政府每月例奏的粮价清单上。清单中，米价开列三种（台湾府开列二种），还列有二麦、黄豆价格。这种格式化的粮价清单书写，其实始于乾隆元年（1736），但是清单上的粮食种类只有米一种，不包括二麦及黄豆。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八月份总督杨应琚陈报的粮价清单首度没有二麦价格，但是福建巡抚钟音陈报的同月份清单则仍含二麦时价。包含二麦价格在内的最后一份清单，现存所见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份。此后闽省粮价清单一直维持只有月报主要粮食价格一米，官方认定的次要粮食价格不再列入陈报对象。缘此，本文获得的二麦价格起讫年限为 1738-175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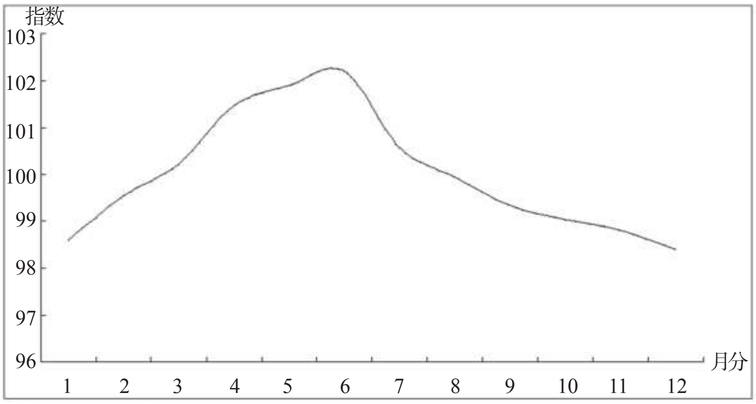


图 1　清代台湾府米价季节变动（1738–1850）

图 1 是 1738-1757 年二麦和米的价格及趋势，皆以年均价表示。长期而言，三种粮价数列都是上升的趋势，以米价升势较为显著，大麦价格上升最缓。价格水平方面，米价价位是最高的，两种麦价之中，小麦较高，但仍低于米价水平。小麦价格平均而言比米价价位低，方能于平抑米价发挥效用。不过，十九世纪初的《续修台湾县志》称：

> 麦，昼开花，异粤、闽而同于齐、鲁，故特美。然少种，价数倍于谷。①

是说因为小麦种得少（或不太栽种），价格比米谷还贵，这是就台湾县而言，并非麦产区一般的小麦价格水平。② 此外应该注意的是，图 2 的米价曲线以 1740、1745、1750、1756 为界，出现三个波动周期；二麦价格大致也是这三个波动周期，但以小麦价格的变动似较挨着米价而行，大麦数列则较不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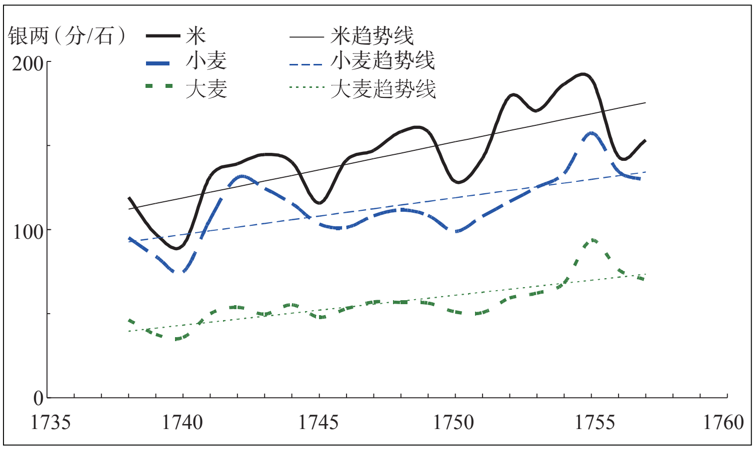


图 2　清代台湾二麦、米的价格及趋势（1738–1757）

---

① 谢金銮、郑兼才：道光《续修台湾县志》卷 1《地志 · 物产》，第 52 页，丛刊第 140 种。

② 《台湾志略》有麦价数倍于谷的记载，乃就台湾县一地而言。李元春：道光《台湾志略》卷 1《物产》，第 36 页，丛刊第 18 种。

三种粮价之间的关联是否如上述观察，现在将这三种价格数列进行相关分析以为证明，其结果列示于表 2。由表 2 可知，大、小二麦价格彼此相关最高，无可怀疑，两种粮食种收季节相当，栽小麦处殆栽大麦。其次，大、小二麦价格均与米价呈正相关，显示米价若高，供给趋紧，需要二麦投入供给行列的量将增加，若量增多则其价格自然趋贵。反之，米粮供给量充裕，米价贱，不需太多麦谷替代补充，二麦的价格就不会趋高。然而由大、小二麦与米价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28、0.37 来看，纵然小麦价与米价的相关比大麦价格来得明显（小麦用途较广），总的来说，两种麦价与米价的相关程度似乎不那么显著，或可言相关稍弱。这表示，虽然每年遇逢稻作的青黄不接时期都有一定量的麦谷投入粮食市场，但是对米价的长期升降而言，可能不具决定性。也就是说，如果二麦，尤其是食用甚为普及的小麦，能对米价升降有所平抑的话，应该是在季节方面，即一年中的某几个月（二麦收成时的低价月），而在长期趋势方面出现的效用可能有限。

**表 2　二麦价格与米价相关分析（1738-1757）**

| | 小麦 | 大麦 | 米 |
|---|---|---|---|
| 小麦 | 1 | | |
| 大麦 | 0.96 | 1 | |
| 米 | 0.37 | 0.28 | 1 |

基于以上观察，以下将选择二麦的收获季节月份进一步验证。二麦之中小麦与米谷的关联较为重要，而据上述，一年中麦价应在西历 4 至 6 月之间渐趋低价，而以西历 5 至 6 月较为显著。考虑到小麦可能在西历 4 月收成时即开始对粮食价格起作用，此处将小麦 4 至 6 月（西历）价格与同月份米价并同观察。而且基于笔者想要了解的是麦谷投入对米价是否起作用，低价数列的米价可能不易观察，因此选择米价的高价数列，与低高两数列的小麦价格一起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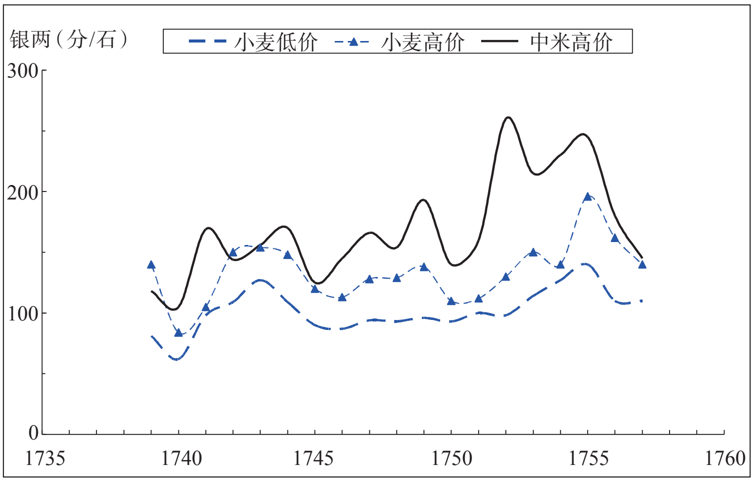


图 3　4 月（西历）米、麦价格（1738–17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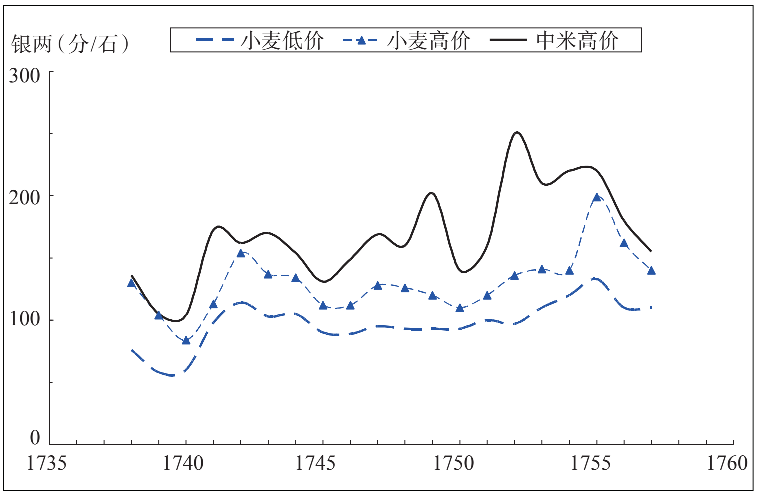


图 4　5 月（西历）米、麦价格（1738–1757）

图 3 至图 5，依序为小麦价和米价的西历 4 月、5 月、6 月曲线图。图 3 的 4 月价格图显示，除了极少数的一、二个年分小麦高价数列超过米价外，绝大多数年份里的麦价都低于米价。这表示刚进入收获季的小麦已开始发生作用，其与米价的价差当可因应米价的趋高。图 4 的 5 月价格图则显示，在

小麦的收获高峰期，麦价都低于米价。而图 5 的 6 月价格又与 4 月价格变动相近，亦即到了小麦收成季节的末月，大部分麦产区的小麦都已登场，麦价来到了最低价月份；但是 6 月的米价是一年中的最高价月份，因此麦价对米价的作用程度较上月稍次。然而无论如何，6 月的小麦高价数列在大多数年份时都是低于米价的。三个月份的小麦高价数列都如此，其低价数列对米价的作用当更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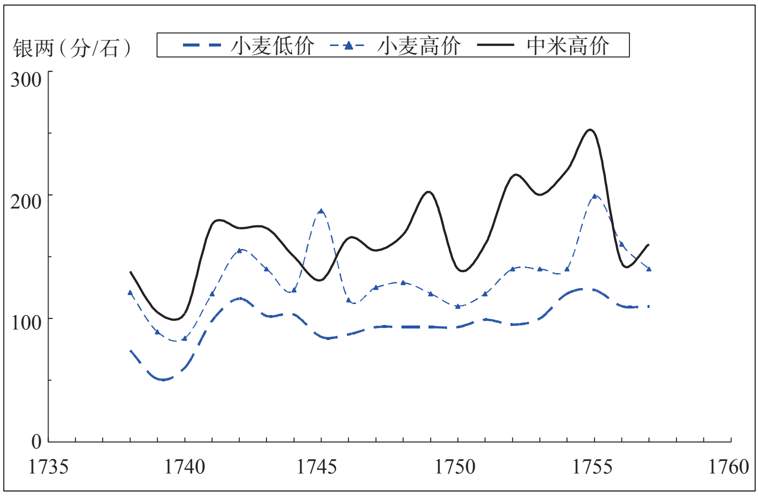


图 5　6 月（西历）米、麦价格（1738–1757）

至此为止的验证，是以价格的变动所做的观察，二麦作为接绝续乏的粮食地位尚是可以肯定的。以下将从代表粮食收获量的指标——收成分数，考察二麦收成对米价的趋高多大程度上发挥着平抑的作用。

## 四、望春花收获，庶几可减？二麦收成对米价变动的影响

清代闽台官员经常折报台地入春以来稍有升昂的米价，在“北路二麦登场，自可平减”，是预期麦收以后米价将会下降；或具述台地三、四月间米粮增昂，幸赖二麦丰收得以及时资济，称“麦收以后，米价顿减”云云，指的是二麦实收之后米价确实下降的观察。[①] 前引雍正七年（1729）福建总督高其倬奏称“现今二麦业已刈获，收成十分有余……米价亦因之更减”，也是相同的观点。二麦收成与米价的关联是否如官方认为的那样？本文将利用二麦收成分数报告，考察二麦在主要收获季节的收成，对青黄期米价平抑的作用程度。

什么是收成分数？收成分数是一种清代创建的粮食生产的量化评估，与现代的粮食生产量概念相近而表达的方式不同。清代有运作良好的粮价陈报制度，但没有粮食产量的陈报或调查，却建立了粮食收成的预估、实收以及年成丰歉的评估制度。每年于收成季节前预估、收成季节时及结束后报告实收，自县而府而省，层层向上册报，并由省级官员汇奏中央，折报时附上收成分数清单。

清代台湾二麦收成分数清单的书写样式，或按分数等级一级级地将各县写入，或按县别逐一标明分数，并注明产区的分数是否二麦皆含或只有其中一种麦作的收获。无论哪一种写法，最后都要统计全省或全府收成的总平均分数。

收成分数采十分位法，每一分相当于 10%，是清代官员对辖区内粮食收成规模的估计。尽管这些年年通报的数据是封疆大吏对年成的主观评估，并不等于实际的收获量，但它仍然相当

① 陈林每：《奏明台湾地方情形事》，乾隆（具奏年月不详），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文献编号 008230。喀尔吉善：《奏闽省雨水收成并查办台湾凶番等由》，乾隆十七年五月初六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文献编号 00846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朝·农业类》，嘉庆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缩微编号 138，档案编号 1879.37。嘉庆二十一年（1816）四月官员报告，台湾冬春异常寒冷，地瓜、杂粮均受霜害，米价也增昂，尤以嘉义、彰化二县沿海贫民民食较为不济，除了劝诱当地殷户分保设厂、捐谷减粜外，官员认为“二麦将熟，粮价可冀渐平”（殆因二麦本可耐寒）。见王绍兰：《奏报本年轮值巡台臣循例亲往查阅台湾营伍及地方情形》，嘉庆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文献编号 047485。

程度代表收获多寡的规模。在没有可靠准确的粮食产量记录的情形下，以收成分数来观察，不致于欠妥。

清代台湾各县造报二麦收成分数的工作，归由县衙门的户粮房负责。据《安平县杂记》：

户粮房……凡赈济事宜，辖内被灾请勘免赋及民人请垦荒地、开筑水圳、报请升科纳赋、严禁私铸银钱、造报二麦收成分数、晴雨、谷价、征收献佃，亦概归经承。①

可知，与粮食生产有关的垦地、雨水、粮价，都是户粮房经承。光绪五年（1879）一份新旧户粮税总书的交接案卷清单上有如下内容：

一、饬造早稻收成分数文册卷壹宗。……一、台湾府蒋关催造报早稻收成卷壹宗。一、台湾府周移造晚稻收成卷壹宗。又关催造送二麦收成卷壹宗。②

据此清单也可以知道，不只是二麦的收成，主要粮食早稻和晚稻的收成册报也是户粮房例行应该经手的职务。在台湾，册报主要粮食收成，指所有稻作（含凤山的双冬早稻），事属当然，然而次要粮食之中只有二麦必须列报，栽植颇为普遍的番薯则未被包含在内，可见官方对二麦的重视。

如本文所述，4至6月（西历）期间是二麦的收获季，若要观察麦谷投入粮食市场后米价的反应，应看相同月份及下一个月的米价是否降低。不过，每年二麦的实收报告大致在收成季节的尾声或结束之后汇报至中央，有时在4月，有时在5月。③此处，笔者将每年一次的二麦收成分数值设定为4月时的值，表示二麦在四月较大量的投入粮食市场，因此应观察米价从4月到5月的反应。再，考虑到价格作用通常在新粮投入后会稍微迟后表现，所以从5月到6月的米价反应也应列入观察。又，据笔者曾建构的台湾在一府时期（1683-1875）可靠的米价数列断限是1738-1850年，④在这起迄年内的二麦收成分数，目前共搜集到55个年分，分布于1739-1824年间。

表3是二麦收成后米价从4月到5月、从5月到6月和从6月到6月的减价反应，以年数的百分比表示。如表3所示，在1738-1824年共有55个二麦收成分数年份期间，当二麦在4月较大量的投入粮食市场后，29%的年份能看到正处于逐渐攀升的米价于5月就有降减之势；而到6月，是米价的最高月，这个月份才降者占18%的年份。这表示二麦的投入，在4至5月间某种程度上有其平抑米价的作用，而其作用在5至6月间递减。同时也意味清代官员所说“望春花收获，庶几可减”的预期有其实际根据，而且虽然5、6月米价都能连续下降者才占15%，却也不能完全否决二麦在米价高价月份粮食供给趋紧时的纾缓作用。

然而更应注意的是，表3指出，有44%的年份显示，二麦的投入对米价4月到6月的上升其实没有起任何作用。这意味在相当多数的年份里，即使二麦丰收，青黄时期米价仍趋高不减，二麦不能影响米价使之下降。或许可以臆测，即便在春夏高米价月份期间，可能受限于食米习惯的缘故，用以替代主要粮食的谷物能否维持一整个青黄期的民食供给，这还不一定。究竟是台地所种的二麦收成规模（收获量）不够大，也就是二麦投入米粮市场的数量不足，以致于青

① 佚名：日治初期《安平县杂记·安平县职官及其衙署》，第94页。

② 《淡新档案选录行政编初集》，《新旧户粮税总书吕祥与李登间交接各案卷》（光绪五年五月初十日）第111号，清单（第112号之附件），11306-1，第117、119页，丛刊第295种。

③ 台湾府的粮食收成分数，是府级官员查照各县申报分数后，再汇造给台湾道及省级官员。不过由于省级官员发现台湾道和台湾府所开分数竟然大相径庭，嘉庆元年（1796）规定台湾府应该预期驰报，亦即“麦收应于二月中旬内开报，二月初五日以前到省。”见《福建省例》之《征收例》，《台湾二麦并早晚稻收成分数饬令预期驰报》，第1161—1162页，丛刊第199种。然而，就笔者所见二麦收成分数报告折，其上奏日期或为三月，或为四月、五月，也有六月者。上奏日期在三月者，应是省例规定的“二月中旬内开报，二月初五日以前到省”，但是更多的是四至六月间的奏报，可见汇报的实情未必都如省例规范的那般。

④ 谢美娥：《清代台湾米价研究》，第73、102页。

黄期米价下降得不显著？还是台民即使在青黄期也不习惯以面食替代米食？两者都不甚清楚。笔者认为，由于 44% 的比例相当高，因此清代官员惯言“麦收以后，米价顿减”的陈述，似是过度强调二麦对米粮青黄不接时期的价格平抑效果。如果再将二麦对于适于贫民、瘠地的属性和功能皆未具备一同考虑的话，则二麦未必如官方所认为般具备接绝续乏角色。

**表 3　二麦收成后米价 4 至 6 月价格的波动（1738-1824）**

| 米价下降月分（西历） | 5 月就降（4 月到 5 月） | 6 月才降（5 月到 6 月） | 5、6 月皆降（4 月到 6 月） | 5、6 月皆未降（4 月到 6 月） |
|---|---|---|---|---|
| 年数 | 16 | 10 | 8 | 24 |
| 比例 | 29% | 18% | 15% | 44% |

图 6 中直条者为各年的二麦收成分数，每个直条都注记了代表 4、5、6 月三个月分的米价符号：—、△、◇。当△、◇两个米价符号价位水平都在—之下时，表示 5 月或 6 月的米价是下降的。相似的表达是，图中深色直条并加注年分者，表示该年米价反应在 5、6 两月都下降。直条外加黑框者，表示该年米价 5 月即有下降的反应。整体而言，二麦收成对青黄期米价的平抑作用，没有清代时人所期待、想象得那么高。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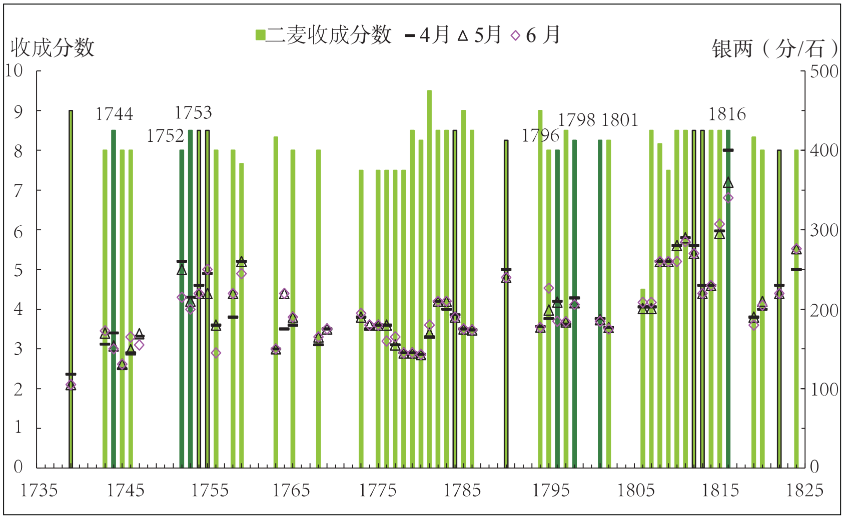


图 6　二麦收成分数与 4 至 6 月米价变动

说明：二麦收成分数为深色直条并加注年分者，表示米价5、6两月都下降；二麦收成分数外加黑框者，表示米价5月即下降。

## 五、结论

对清代台湾粮食作物体系，一般认为，主要粮食是稻米，而番薯为最重要的次要粮食。然而在清代的雨水粮价折中，闽台官员时常于春夏时节奏报名为春花的作物收获，并认为春花对于平抑米价升昂的作用内生于稻米以外的其他粮食。当春夏间米价升高，则“望春花收获，庶几可减”，春花是接绝续乏之谷。这类作物在清代台湾官方眼中显然有其重要性，惟近人论著未见相关讨论。缘此，本文企图厘清春花的内容、种植分布及其与主要粮食稻米的供给关系，并验证清人认为春花具有平抑米价作用的认知是否合理或合于实情。

在清代台湾，春花作物的核心是二麦。本文利用二麦价格和二麦收成分数进行考察：二麦

① 能让六月的高米价明显下降者，可能是 6 至 8 月（西历）双季稻的早稻和单季早稻的收获所致。见谢美娥：《清代台湾米价研究》，第 248—249 页。

价格与米价变动的关联、二麦收成对青黄期米价变动的影响。清代台湾的二麦价格与二麦收成分数这两种数据史料，台湾史学界尚未有人利用。

第一项考察，从《清代粮价资料库》取得 1738—1757 年二麦价格，将之与米价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虽然小麦价与米价的相关，比大麦价格与米价的相关相对明显，但由大、小麦价对米价的相关系数为 0.28、0.37 可知，两种麦价与米价的相关程度不显著（相关稍弱）。这表示虽然每年青黄期都有一定量的麦谷投入粮食市场，但是对米价的长期升降可能不具决定性影响。换言之，二麦若能对米价升降有所平抑的话，应该在季节方面，亦即在某几个二麦的低价月起作用，而不是在长期趋势方面。据此，笔者将小麦 4 至 6 月（西历）价格与同月份米价并同观察。其中，5 月价格显示，在小麦的收获高峰期，麦价都低于米价。而 4 月和 6 月价格显示，大多数年份的麦价也都低于米价。这表示以四至六月的价格水平来看，二麦作为接绝续乏的粮食地位可予肯定。

第二项考察，在于获知二麦收成对米价可发挥多大程度的平抑作用。笔者设定每年的二麦收成分数值为 4 月（西历）的值，以此观察米价 4 月到 5 月、5 月到 6 月以及 4 月到 6 月是否出现下降反应。考察结果显示，二麦在 4 至 5 月间有平抑米价的作用，但在 5 至 6 月间递减。这意味清代官员所说“望春花收获，庶几可减”之语有其实情依据。又，虽然米价 5、6 月都能连续下降的年数才占 15%，但不能完全否定二麦在米价高价月份有其纾缓作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 44% 的年份显示，二麦的投入对 4 月到 6 月上升的米价其实没有起到作用。这表示有相当多的年份，即使二麦丰收，青黄期米价仍然趋高。因此清代官员惯言“麦收以后，米价顿减”的陈述，可能过度强调二麦对米粮青黄期的价格平抑效果。

至于具备适于贫民、瘠地、济荒的属性和功能的番薯，其对青黄期米价是否也具有平抑效果？其效果是否超过春花二麦的作用？由于番薯价格数据的缺乏，无法证得。但是清人奏折确实提到番薯与米价变动的关联，例如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福州将军新柱就称“台湾府米价，因值麦、薯及南路双冬早稻成熟，较前稍平”。[①] 番薯收成其实可与春花二麦一样，对青黄期米价产生作用，惟与二麦相衡之下，清人并不强调番薯在这一方面的角色。

## References


Du Halde, Jean-Baptiste, ed. *Yesuhuishi Zhongguo Shujian Ji: Zhongguo Huiyi Lu*（The Travels of Several Learned Missioner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into Divers Parts of the Archipelago, India, China, and America）. Translated by Zhengdedi, Lu yimin and Shen Jian. Volume 2, Zhengzhou: Daxiang Press, 2001.

Hong Anquan, ed. *Qinggong Gongzhongdang Zouzhe Taiwan Shiliao*（The Taiwan Historial Meterials from Qing Palace Memorials）.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2001-2003.

*Junjichu Lufuzouzhe : Jiaqing Chao Nongye Lei*（The Memorial Transcript of the Grand Council: Agriculture Category during Jiaqing Emperor Period）. Beijing: The First Historial Archives of China, microfilm.

*Junjichu Quanzong, 1729-1911: Junjichu Lufu Yongzheng and Qianlong Chao*（The Grand Council, 1729-1911: The Memorial Transcript of the Grand Council during Yongzheng and Qianlong Emperors' Period）. Beijing: The First Historial Archives of China, microfilm.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he Database of Ch'ing Palace Memorials and Archives of the Grand Council*.

National Palace Museum. *Gongzhongdang Jiaqing Chao Zouzhe*（The Palace Memorials during Jiaqing Emperor Period）.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ress, 1993-1995.

*Qing Shilu: Gaozong Chun Huangdi Shilu*（Facts of the Qing Dynasty: Facts of Emperor Qian L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The First Historial Archives of China and Cross-Strait Publishing and Exchange Center, ed., *Ming Qing Gongcang*


① 洪安全主编：《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第 7 册，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第 286 页。

*Taiwan Dangan Huibian*（The Collection of Taiwan Archives in Ming and Qing Palaces）. Beijing: Jiuzhou Press, 2009.

The First Historial Archives of China. *Guangxu Chao Zhupi Zouzhe*（The Collection of Memorials Comments Written by Guangxu Emperor）.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5-1996.

The First Historial Archives of China. *Yongzheng Chao Hanwen Zhupi Zouzhe Huibian*（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Memorials Comments Written by Yongzheng Emperor）. Nanjing: Jiangsu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6.

*Tiben: Yushui Shoucheng*（Qing Memorials: Rain and Harvest）. Beiji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Wang Bichang. *Yongzheng Zhupi Zouzhe Xuan Zhi*（The Collection of Memorials Comments Written by Yongzheng Emperor）. Taiwan Wenxian Congkan, No. 113.

Wang Yeh-chien ed. *Qingdai Liangjia Ziliaoku*（The Database of Qing Grain Prices）. http://mhdb.mh.sinica.edu.tw/foodprice/.

## "Spring Flowers" (Wheat-Barley-Beans）and the Food Supply of Taiwan in the Qing Dynasty

HSIEH Mei-e（Department of History, Cheng Kung University, mio168@mail.ncku.edu.tw）

**Abstract** Most of scholars prefer to mention only the primary grain, rice and the secondary grain, sweet potatoes when discussing food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Taiw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hile they ignore another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grain market, the cultivation and price of "spring flowers" (wheat, barley, and beans). Local officials at the county level were required to report annual summer and autumn harvests. The autumn harvest meant rice and the summer harvest referred to the spring flowers and the early ripening rice. Both spring flowers and sweet potatoes were considered to be important secondary foods, however,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regulations, the summer harvest report included spring flowers but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sweet potatoes. Sweet potatoes fed the poor and were cultivated on marginal land but spring flowers were grown on paddy land and rotated with the rice crop. Previous research has overlooked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spring flowers.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cultivation of spring flowers, and the association of its prices, chiefly wheat prices, with rice prices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Keywords** Spring Flowers, wheat and barley, harvest ratings, food supply, Qing Taiwan